

1921年10月17日下午，標榜「提升台灣文化」為宗旨的「台灣文化協會」在台北市大道埕靜修女子學校，舉行創立大會與成立典禮。「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後不久會員人數就超過1000人，幾乎囊括了當時台灣的開明士紳與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們，因此很快便成為20年代被稱為「文化啟蒙運動」的主要團體。

「台灣文化協會」得以在1921年底出現，有各種內外的主客觀條件。首先，在國際上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十九世紀以來帝國主義擴張的重整、殖民主義緩和化，和俄國革命的大背景。在日本，則有日本近代史上的「大正民主」，1918年原敬內閣的成立也宣告日本近代政黨政治時期的開始。更重要的是，1919年韓國的「三一獨立運動」明確地向日本提出抗議，針對這個來自殖民地（外地）的衝擊，日本的原敬首相趁勢打出了他向來主張的「內地延長主義」，企圖以調整殖民地統治原則來補救殖民地統治呈現的破綻。在台灣方面，1919年底明石總督去世時，不但直接葬在台灣，而且日本趁機任命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接著進行一連串統治政策與制度的改革。田健治郎在任時期（1919.10~1923.09）的諸多主張，可以說就是在體現內地延長主義與「文化政治」。田健治郎時代的這些殖民統治政策與施政的主張，為1920年代台灣的政治運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文化運動（「台灣文化協會」）提供了制度上與理論上的基礎。

但是，最主要的還是到了1920年代初期，台灣出現了一個新的知識世代。日本殖民者來到台灣，同時也引進了西洋式的學校教育制度。這種西洋式的學校教育，不論是形式或者內容都與傳統中國科舉教育不同。1920年前後，接受這種日本殖民者引進的西洋式教育的新一代台灣知識青年已經長成，並且有一定的數量。這些人也就成為「台灣文化協會」最重要的成員。這些新一代的台灣青年，在當時的台灣社會中，不論是經濟基礎，或是社會地位，都是比較高的。更重要的是，他們擁有當時被視為「進步」、「摩登」的西洋知識。

這些新一代的台灣知識份子，有的是台灣島內總督府醫學校、師範學校的學生，有的是留學日本、中國得以親自去見識更廣大世界的台灣青年。這些青年透過日文獲得了西洋的知識，甚至透過日本近代引進西洋制度、思想觀念的觸發，或者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鼓舞，痛感台灣社會、文化的「落後」與「貧瘠」。因此，以極度的熱情企圖引進他們所接觸到的「西洋近代」。當時文化協會的活躍人物蔣渭水說：台灣人罹患「知識的營養不良症」，文化運動是對症下藥唯一的原因療法，文化協會就是專門講究並施行原因療法的機關。

文化協會在這些熱情的青年學生急切地想將西洋近代的觀念、思想傳播到台灣社會，

又有地方開明士紳的配合，因此在全島熱烈地舉辦演講會、設置「讀報社」、發行會報，舉辦「夏季學校」，甚至組織「美台團」下鄉放映電影。這些活動的確為台灣注入了一股新氣息。更重要的是，雖然文化協會號稱是一個文化啟蒙團體，但是由於推動的都是台灣本地的士紳與青年學生，因此被看成具有民族色彩的台灣人運動，而且難免不會進一步挑戰了日本殖民體制。所以，文化協會啟動之後，便同時帶動了學潮和激勵了台灣人要求改善政治、經濟處境的政治運動。在 1920 年代前半期，台灣文化協會可以說是殖民地之下台灣人運動的總匯集。但是，如今回顧這個在 1920 年代初期蓬勃地展開的台灣人運動，卻也不能不有所反省。

文化協會成員（尤其是青年學生）之所以積極地推動「文化啟蒙」運動，最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接觸到了對他們來說完全新鮮的「西洋近代」，一方面又感覺到與「西洋近代」相比，「東方」顯得落後、不堪。這種對「西洋近代」的憧憬，加上自身落後的焦慮感，使得台灣青年顯得特別急切，因此希望很快地將他們所知道的「西洋近代」介紹進台灣社會來。所以，可以看到一些到日本內地留學的學生雖然未必見得已經有深入的瞭解，便迫不及待地利用暑假回台將他的所學介紹出來。

台灣青年不但對西洋近代的瞭解不夠深入，對於台灣的社會現實也缺乏瞭解。對他們來說，台灣就只是個亟待迎頭趕上西洋的落後故鄉，當務之急就是趕快將西洋近代搬回家。但是，台灣的一切難道都是不值一顧的渣滓嗎？他們所一股腦將要介紹進來的「西洋近代」，如何被台灣社會接受？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台灣社會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容器？就這點而言，台灣青年卻思考不多，或者是過度樂觀。文化協會既然希望進行台灣文化的改造，便不能只是將他者的文化介紹進來，而必須講究使這些原本不是台灣的「文化」如何在台灣社會植根的辦法。而這是需要對台灣社會及傳統的「文化」進行深入研究與分析的。台灣青年顯然熱衷於介紹新知而疏於瞭解舊習。因此，這些西洋新知就只能成為台灣社會表層的時髦消費品，或僅止於一小部份人的「文化」而已。

台灣青年的西洋認識是透過日本而來，而且承認日本在學習西洋方面已經比台灣更進步，因此自然形成了「西洋—日本—台灣」的高低序列。這種全面地肯定西洋近代，卻未能洞燭其中所具有的暴力性格，便很可能被其工具性的科學、效率、秩序所說服。於是，這個在 1920 年代被當成台灣人希望的蓬勃運動，在 1930 年代中期以後，反而被日本的法西斯主義所吞沒了。